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工业化中期中国经济 发展战略探讨

李 卓/著



科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工业化中期中国经济 发展战略探讨

李 卓/著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
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国际比较研究》(16JJD790045)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政府引导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两大方向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探讨。上篇基于政府引导发展战略视角,对比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梳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从政府与市场关联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政府发展战略与经济关联性的影响,分析政府引导和推行发展战略对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下篇分别基于劳动收入占比和企业生产率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在劳动收入占比视角中,分析导致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的主要因素,在企业生产率视角中,从企业研发、产品出口和出口产品价格加成等方面研究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特征。

本书可供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对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问题感兴趣的理论工作者与政策制定者阅读参考,也可以作为经济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业化中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探讨 / 李卓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2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978-7-03-056712-3

I. ①工…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IV. ①F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3913 号

责任编辑: 徐 倩 / 责任校对: 胡小洁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1/16

201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3/4

字数: 235 000

定价: 9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总 序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初步转变为工业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在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要素、发展问题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需要新的发展动力。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发展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发展经济学是唯一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分支学科。长期以来，武汉大学一直在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富有影响力。改革开放之初，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谭崇台最早把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1990年，谭崇台先生发起并创建了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被教育部确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唯一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发展研究为己任的研究机构，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肩负着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咨询服务、思想传播等使命。我们计划从2017年开始陆续推出五个系列学术产品：“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发展经济学研究》、《珞珈智库·经济观察》、《珞珈经济年度论坛》和《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并统一标识、统一装帧设计。

以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实践，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追求。策划出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其目的不仅仅是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示和检阅本中心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激励学者在全球经济的视野中把握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经验事实中探寻发展的逻辑，从中国发展故事中凝练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经验与理论，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注入中国元素，为开创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中国时代，贡献我们的力量。

这是中国经济“摸着石头过河”之后千帆竞发的航海时代，这是中国经济学界贡献创新的黄金时期。前行中的每一片迷雾，每一座冰山，每一阵风暴，都考

验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航路上的每一次挫折，每一个欢笑，也都是经济学研究难得的经验素材。生活在深刻变革的时代，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我们躬逢其盛；与伟大的实践同行，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我们责无旁贷！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6月26日

目 录

上篇 发展战略与经济理论概述

第一章 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综述	3
第一节 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3
第二节 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6
第三节 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战略	12
第四节 结论	17
第二章 政府引导的发展战略与经济关联逻辑	19
第一节 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战略的有关理论	20
第二节 研究政府引导的发展战略的理论现实意义	23
第三节 政府引导的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25
第四节 政府引导发展战略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联性	27
第五节 政府引导发展战略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特征性事实	31
第三章 政府引导的发展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46
第一节 政府引导的发展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分析	46
第二节 政府投资行为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分析	57
第三节 东亚模式下政府引导的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日本为例	68

下篇 对外开放战略的影响

第四章 贸易开放战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	83
第一节 劳动收入的国际国内趋势	84
第二节 贸易开放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理论概述	87
第三节 中国的对内赶超发展、对外开放战略的分配效应	96
第四节 偏向型技术进步下的收入分配模型	98
第五节 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	103
第五章 贸易开放、研究和开发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126
第一节 贸易开放、研究和开发与企业生产率关联性的理论逻辑	126
第二节 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模型及推论	132
第三节 研发企业与进口企业特征分析	136

第四节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143
第六章	制造业出口价格加成与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	155
第一节	企业价格加成与企业生产率关联性逻辑	155
第二节	企业价格加成模型分析	157
第三节	企业出口状态描述性统计	160
第四节	企业生产率悖论实证分析	162
参考文献		168
后记		181

上篇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 展的理论概述

第一章 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综述

依据各种宏观经济指标，2005 年中国经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2015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0251 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区间。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更是首次突破 90 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一方面是借鉴了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和东亚及拉美在经济发展模式与战略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实行了渐进式的或增量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形成了逐渐丰富、逐步完善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

但是，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仍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一方面，中国在经济的发展中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依然较低，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渐强化等，而始于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使有关问题更加尖锐化、复杂化，迫切需要我们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与隐忧，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本内容，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势必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相应转变。中国既然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借鉴他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趋利避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and 战略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

世界各国（地区）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结构转化、能源资源消耗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对工业化中期阶段典型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后出现的新特征，及时调整策略、采取应对措施。

本章基于探究适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战略这一目标，首先，将从当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过去 40 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其次，通过与国外典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最后，结合发展经济学理论对政府干预与市场主导的分歧，提出政策引导国内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第一节 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最著名的当属库兹涅茨（Kuznets, 1971）对各国

现代经济增长的分析以及罗斯托（Rostow, 1959）的增长阶段论。苏永强和沙景华（2009）基于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统计模型，从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演变、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四个方面，研究得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库兹涅茨模型中的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王小刚和鲁荣东（2012）认为需要在两个方面对库兹涅茨理论进行修正：一是不应把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的上升作为测量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指标，推进工业化不仅是扩大工业规模，还对加快现代服务业工业化的进程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判断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或工业化发展进程要考虑各个区域工业化的多样性，包括区域的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和产业分工的差异，要更多地考虑居民收入提高、非农产业就业比例、绿色经济发展等因素。邹东涛（2008）从农村人口比例、城市化水平等因素考虑，并对照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中国尚达不到经济起飞阶段，仍然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即中国的发展阶段仍然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周庆华（2011）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征错综复杂，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的混合；中国当前大体上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的交替时期，同时带有某些信息化或知识经济的成分。

而关于工业发展阶段划分，最著名的当属霍夫曼等（Hoffmann et al., 1958）的四阶段论和钱纳里（Chenery, 1958, 1960）的六阶段论。王树华（2008）参照钱纳里的六阶段论，指出我国目前应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初级阶段；在霍夫曼等的四阶段论中，我国大致处于资本资料工业加快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总体而言，我国应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杨海军等（2008）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并没有伴生相应的城市化，因此霍夫曼系数法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对我国的工业化阶段的判断，需要引入农村人口比例这一变量对霍夫曼系数法进行修正。陈一鸣和全海涛（2007）依据钱纳里工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政府政策及经济体制、国际环境三方面内容，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优先发展重工业阶段、消费导向型工业发展阶段、全面市场化转型阶段、新型工业化阶段，并认为自 2002 年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以来，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牛文涛（2008）依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的标准模式，选择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测度指标，认为我国 1978~1985 年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1986~1993 年为工业化初期阶段，1994~2002 年为工业化中期阶段，2003 年至今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陈佳贵（2008）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方面对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 2005 年全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其中东部 10 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东北 3 省处于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中部 6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西部 12 省（自治区、直辖市）则处于工业化初期后半阶段。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世界银行专门以人均国民收入为衡量指标,对全球各国家和地区进行收入分组,从而区分各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世界银行在 2011 年 7 月更新的收入分组标准中,将人均国民收入在 1005 美元以下的国家定为低等收入国家;将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006~3975 美元的国家定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将人均国民收入在 3976~12 275 美元的国家定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将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2 276 美元及以上的国家定为高等收入国家。而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 2016 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其基本含义是:一个经济体在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00 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将迅速向 1000~3000 美元的起飞阶段过渡;但是,一旦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000 美元的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和矛盾将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难以克服自身矛盾或者因发展战略失误以及遭遇外部冲击等影响,致使经济增长回落、经济发展出现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既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内经济学者已经开始进行有关问题的研究。

蔡昉(2008)认为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中国从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可以促使消费需求驱动的增长,改变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可持续性;把握好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和限度,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效果,可以解决收入分配中不公平的问题。马岩(2009)根据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地理分布和变化特点选取了拉丁美洲、资源立国型国家(中东和俄罗斯)和东亚等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收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把影响其发展模式变化的六个重要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最重要的顶层因素是政府积极、有效和及时发挥资源配置职能。乔榛(2010)认为我国面临着一些类似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其中经济发展中潜在的最大风险是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构造的突破口。胡鞍钢(2010)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所以应该转变国内生产总值盲目崇拜和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加快经济社会转型,谨慎地选择变革方式,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实现经济与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和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化阶段划分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国外有关理论,并通过构建各种经济指标,如人均国民收入、产业结构比例等,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中国工业化发展所处的阶段。这类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在向中后期阶段迈进。

第二节 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有必要针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外典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有助于我国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为探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and 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有助于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制定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和战略。

一、国外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一) 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模式

作为发达国家中的后来者,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这几个北欧国家,从20世纪二三十年起,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中间道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几个国家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形成了北欧模式。

从经济制度的形式和属性看,北欧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企业所有制形式以私人经济为主,但是,国有经济都占据一定比例,股份制企业发达,是典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北欧国家政府通过财政、货币、就业、收入、贸易投资和外汇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指导,对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经济增长、稳定价格水平、维持充分就业产生了较大作用,是北欧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韩保江,2008)。因此,北欧国家是典型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以标准高、平均化、范围广、制度化和政府全面承担为特点,但是社保基金的入不敷出和“福利病”的日益严重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与其人口不多、民族和谐有关,确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但北欧模式的成因并不主要在于它的一些特殊条件,而在于北欧国家的经验是一种平衡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式,目标是促进全面的福利改进,因此,北欧模式对于中国实现建成小康社会、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等均具有参考价值。

(二) 美国经济发展模式

赵宏(2009)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崇尚自由主

义和充分竞争,主张资源配置全部由市场来进行,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范围内。该模式因美国在战争、自然资源和货币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与优势而难以复制,其长年巨额的贸易赤字的弊端也相当明显。曾铮(2011)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三个方面,将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创新型模式。创新、科研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国内消费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源泉。美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研发投入快速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技术、金融的创新,促使消费产品以及消费融资模式供给多样化,从而充分挖掘了国内消费潜力。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征。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市场经济遵循平等竞争原则、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减少政府干预程度等,是美国经济发展体制的主要特征。创新型模式使得美国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点:消费率较高,同时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对外账户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服务业发展十分迅速。

(三) 日本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式

周茂清(2003)从工业化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形式的不同,将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外贸主导型模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限制外国竞争,保护本国产业,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以减少进口需求。第二,大力振兴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第三,动员国内储蓄,限制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曾铮(2011)认为外贸主导型模式,使得日本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期,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000 美元左右水平的目标,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跨入了成熟经济阶段的门槛。但是,日本经济仍旧存在着产业竞争力不高、增长模式过度依赖于设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许多问题。面对这些经济困境,日本政府开始改变基本经济发展战略,采取措施,以寻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积极构建节能环保型经济。李晓娣(2006)从产业结构转换的角度,将新加坡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历程分为了五个阶段:转口贸易阶段,进口替代工业阶段,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阶段,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工业阶段,以知识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阶段,并指出新加坡在产业政策、人力资源、全球经济视角的战略调整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

(四) 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

北美的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以及南美洲,总计 33 个国家和地区属于拉丁美洲,拉美国家发展模式依次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早期进口替

代发展模式和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开启了拉美的工业化进程,出口部门的繁荣带动工业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使拉美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增长(刘婷,2001;韩琦,2002,2003),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当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价格呈下降趋势时,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弹性低,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出现波动的频率和幅度较大(江时学,1996);到 20 世纪 30 年代,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转为进口替代发展模式;60 年代,拉美国家进一步将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向纵深推进,但始终未能完成从内向工业化到外向工业化的转变;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和 70 年代中期拉美的债务危机,导致拉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美国政府的影响下,拉美国家采取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从而摆脱了“失去的十年”的阴影,形成了以发展资源加工工业为主和以发展出口加工装配工业为主的两种新的生产专门化模式(苏振兴,2001),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带来诸多缺陷,如贸易逆差扩大、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对外资过度依赖、失业严重、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陈彩娟(2009)认为,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于 1992 年和 1997 年超过或接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000 美元后,纷纷落入“拉美陷阱”,普遍出现金融危机、生态恶化、社会动荡、经济滞胀等现象,其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主要有经济增长停滞、经济安全受到冲击、基尼系数提高、社会治安恶化。

二、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990 年由约翰·威廉姆逊(Williamson,1990a,1990b,2000)针对有关拉美国家经济调整中已经采用和建议采用的政策主张进行总结,提出基于经济自由思想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因为讨论有关问题的会议由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组织,而该机构的总部、美国财政部以及广泛参与拉美经济改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设在华盛顿,所以有关的共识意见称作华盛顿共识。这一针对新兴拉美经济体完善经济发展战略的“策略清单”主要包括:财政赤字预算控制;公共开支应侧重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扩大税基,公平税率;金融业自由化,放开利率;统一的利于出口的外汇兑换率;国际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消除对外资限制,促进公平竞争;国有变私有;产业准入限制放松;私有产权保护。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Stiglitz,1998)。

华盛顿共识自提出以来受到很多挑战,例如,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的危害在于形成了一种教条,其之所以广为流传只是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即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

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可给出系列的政策建议(Stiglitz, 2004)。拉美经济的现实发展表明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根本无法帮助有关国家摆脱发展停滞的困境。东欧转轨经济国家休克疗法的失败、亚洲金融危机中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政策上的失误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都使人们对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进了学术界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一篇调查论文中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和积聚能量,并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创新及按照自身特点和想法寻求发展的模式,值得其他国家仿效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Ramo, 2004)。

自国外学者提出北京共识后,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北京共识和在其基础上引申、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有关问题,并围绕相关概念提出的背景、原因以及所涉及的问题和范畴等展开讨论,得到的基本共识是目前尚无一个内涵明确的中国模式(俞可平和庄俊举, 2004; 俞可平, 2009)。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提出让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中国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独特模式,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赵晓(2004)指出相对于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但也有学者不认同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提法。姚洋(2008)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年所创造的非凡成就并不意味着中国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因为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建立市场制度的轨迹走的,中国在过去30年所追求的目标与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经济政策相比几乎没有差距。但他同时认为,拒绝中国模式不等于说中国没有经验可谈。黄亚生(2012)并不认同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因为从全球视角来看,针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针对印度、巴西等的经济政策、发展路径以及政治制度等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模式并不独特,无论从成功经验(东亚模式)或发展欠缺(拉美模式)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基本的发展原则。

与华盛顿共识相比,中国在公司治理、法律和金融等领域的制度还有待完善,并且中国模式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是非传统的甚至与标准的政策建议直接相悖(Weitzman and Xu, 1994)。Rodrik(2006)把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政策措施与华盛顿共识进行对比,认为其政策与传统的政策背道而驰:

贸易保护程度很高，私有化不足，实施粗放式的工业政策以及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认为两个经济体几乎不能看作应用华盛顿共识的例子，也许只有那些令人沮丧的失败事实而不是他们的成功，才能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提供更有利的证据支持。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

中国在过去 40 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一方面是借鉴了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和东亚及拉美在经济发展模式与战略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中国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领域实行渐进式的或增量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完全主导转变为适度干预；基于经济分权的地区改革试验。

（一）政府逐渐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在三年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后，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开始进入计划经济阶段。尽管计划经济制度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明显超过巴西、埃及、印度等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Morawetz, 1978），但是因为政府完全主导了经济决策、监督和实施，而政府信息不充分和管理能力有限，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了监督实施的成本，所以计划经济的缺点凸显，即非经济目标导向的政策、制度上的缺陷和激励机制的缺失。于是政府失灵的代价便是经济波动大、结构失衡、生产力停滞不前和低生产效率导致的资源浪费严重（Brandt and Rawski, 2008）。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是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开端，政府开始逐步通过改革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的范围和力度。首先，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中国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成为 1978~1984 年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Lin, 1992）。随后，政府又通过对部分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定价实行双轨制，降低对市场商品价格和经营的直接干预，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而这种市场导向的价格改革和对从价格变动中寻求利润的限制的部分解除，给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直到 1992 年，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观念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也得到确立。Brandt 和 Rawski（2008）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激活了激励机制、要素流动性、价格弹性、竞争与开放等若干个经济中的重要元素，未来将继续在其他领域，如投资决策、资本市场和所有权转移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但是，东亚和拉美的发